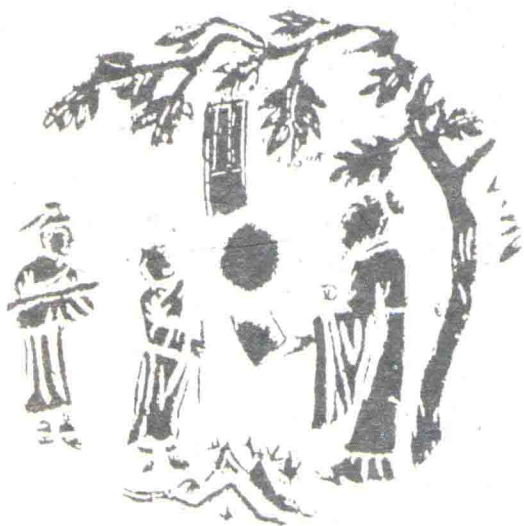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丛书
单承彬 总主编

王群
主编

古代汉语

教学与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丛书
单承彬 总主编



王群 主编

古代汉语 教学与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近年来《古代汉语》教材的新变化

一、新中国成立后《古代汉语》教材编纂的历史回顾

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汉民族的书面语言系统,“我手写我口”式的白话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记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文言文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才能够阅读和理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高校文科“古代汉语”课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大学“古代汉语”课程成为文科许多专业的必修课程。与此相适应,《古代汉语》教材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最早的有代表性的教材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这套教材确立了大学文科“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明确了“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文言文”,奠定了“古代汉语”课由“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部分组成的知识框架。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至今仍是同类教材中的经典之作。此后众多的《古代汉语》教材都是在这套教材的影响下编纂的。这套教材初版于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修订,从而更加臻于完善。但是,随着汉语史领域文字、语法、词汇等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教学中问题的涌现,这套教材容量过大、观点传统等问题也渐渐凸显出来。因此,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新编的教材越来越多,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第一类,保持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结构框架,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2月第2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1月第3版)、马汉麟等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中州书画社1982年6月第1版)、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解惠全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等等。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第二类,内容分“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该教材分上下两册,一册为“文选”,一册为“通论”。类似的还有张世禄、严修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2版)、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等等。有的教材虽然只有一册,但是把“通论”与“文选”分为两部分,如王宁主编的《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和殷国光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都是这种形式。

第三类,只有“通论”内容,“文选”则在教学中临时补充,如殷孟伦等主编的《古汉语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周秉钧等主编的《古汉语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后更名为《古代汉语纲要》,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重印)。类似的还有王宁等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张双棣等主编的《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等等。

以上三种类型的教材各有利弊。从知识的系统性来看,把“通论”和“文选”两部分分开比较好;但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如果两部分内容互相穿插,则更有优势。根据初步了解,在教学中使用上述第一类教材的院校比较多。

二、近年来《古代汉语》教材的新变化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语研究的深入,近几年的《古代汉语》教材编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的来看,体现出专业化、成熟化、系统化、合理化的特点。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1.《古代汉语》的使用对象和“古代汉语”教学目的的变化

王力等在编纂《古代汉语》教材的时候,并不只是针对中文系,而是针对所有需要阅读古文、古籍的专业,包括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哲学史专业以及其他需要跟古籍打交道的专业。这就决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①。近几年,随着高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充实,《古代汉语》教材编纂体现出专业化、多元化趋向,比如有的《古代汉语》教材就特别注明“艺术专业用”等,历史系的“古代汉语”教学基本上被“历史文选”代替,一些法学院校和专业开设了“法律古文”,中医药院校开设了“医

^①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页。

古文”……在这种形势下,“古代汉语”课就几乎成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基础课,《古代汉语》教材也渐渐为中文系专用,不再或者很少与历史专业、哲学专业等其他专业兼用。这样,“古代汉语”课在“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大目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要求,更加注重汉语史基础知识的介绍,为学生深入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因此,有的“古代汉语”课的教材就直接更名为《古汉语文献导读》^①,近年又出版了《近代汉语读本》^②、《中古汉语读本》^③。这些基础读物的出现,体现了“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不再仅仅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同时也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汉语史打下基础。

2. “古代汉语”观念的变化

在“古代汉语”课程中的“古代汉语”,以往指的是文言文,包括汉代以前的所有文献以及汉代以后的仿古的文言文。郭锡良等在《古代汉语·绪论》中说:“汉语的古代书面语大致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六朝以后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文言。”^④这一观念中的“古代汉语”并不能扩展为“古代的汉语”。这与可以和“现代的汉语”相对立的、意义接近“古代的汉语”的“古代汉语”(包括上古、中古、近代)所指是不同的,与“汉语史”中作为汉语一个早期阶段的“古代汉语”所指也是不一样的。“古代汉语”课程中的“古代汉语”基本上是指文言文,可以作为和“白话文”相对立的概念;而一般意义的、可以和“现代的汉语”相对立的、意义接近“古代的汉语”的“古代汉语”(包括上古、中古、近代)是专门和“现代口语”相对立的概念,指以往的所有的汉语书面材料;而“汉语史”课程中的“古代汉语”是和“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等相对立的概念,指汉语的一个历史阶段、特定分期。以上三种语境下的“古代汉语”的所指和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80~90年代所编纂的大部分《古代汉语》教材,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古代汉语=文言文”的观念下编纂的。如上述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还有张世禄、严修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⑤等。

① 韩峥嵘主编:《古汉语文献导读》,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版,2005年修订版。

③ 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

④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上册,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⑤ 张世禄、严修主编:《古代汉语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但是,“古代汉语=文言文”的观念受到了挑战,因为随着以汉译佛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古汉语和以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宋儒语录等近代白话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近代汉语”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那种“白话文”比文言文好懂、“读懂文言文就能读懂白话文”的传统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献等“古白话”,其理解难度绝对不亚于文言文。一个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可以借助注解顺利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但是要阅读汉译佛典、敦煌文献等“白话文”,却困难重重。

汉译佛典、敦煌文献、禅宗语录等白话文献也是“古书”,如果学生在学习了“古代汉语”之后,对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景德传灯录》以及敦煌变文等“古书”不能顺利阅读的话,那么“古代汉语”课就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

因此,近几年的一些《古代汉语》教材,更新了“古代汉语=文言文”观念,把汉魏以后的白话文献也纳入到“古代汉语”的教学领域中。这样,“古代汉语”的概念内涵更接近于“古代的汉语”了。如周光庆、杨合鸣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中说:“我们选编了上古、中古、近代文献而以上古文献为主,选编了文言、白话文献而以文言文献为主,选编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而以传世文献为主。”^①

3. “通论”部分知识系统的变化

王力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开辟了《古代汉语》教材编纂的道路,也奠定了后来《古代汉语》教材中“文选”“常用词”“通论”三部分内容相互穿插又各成系统的知识框架。王力等主编的《古代汉语》的“通论”部分,共分32个专题,介绍了阅读古书所需要的文字、音韵、古书注解、词汇、语法、修辞、文体、古代文化常识、诗律、词律、曲律等方面的知识。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的“通论”部分,基本上继承了王力等的传统,除了在“古代文化常识”方面进行了删减之外,其他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近几年新出的《古代汉语》教材,在“通论”部分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更加专业化。大多《古代汉语》教材删除了“古代文化常识”,因为这部分内容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科举等,每一部分都是专门学问,很难在“古代汉语”课上讲授。

^① 周光庆、杨合鸣主编:《古代汉语教程》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第二,知识系统的更新。新《古代汉语》教材重点讲解文字、音韵、训诂、语法、词汇、修辞、工具书等,每一部分的知识都相应地补充了新的知识。以“工具书”部分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前,《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故训汇编》《古代汉语词典》等重要工具书还没有编纂、出版,所以“工具书”部分只能介绍《康熙字典》《辞源》和《辞海》等几部旧工具书。如今,既然《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故训汇编》等已经出版了,自然应该补充到《古代汉语》教材中。如果今天的“古代汉语”课,只是介绍《康熙字典》《辞源》和《辞海》,而不介绍《汉语大词典》和《故训汇编》的话,显然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因此,新出的《古代汉语》教材,都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补充。

第三,学术观点的更新。比如“语法”部分,早期的《古代汉语》教材受当时语法史研究水平的制约,往往用“词类活用”“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概念解释古代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近年来,随着古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入,对这些提法进行了更新。比如以往所说的“词类活用”,其实包含了“一词多义(如‘名动同词’)”“变调构词(传统所说的‘破读’)”“临时修辞用法”等几个方面;至于“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也已经作为古代汉语中特殊的述宾关系来对待。再如洪波主编的《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放弃了“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等概念,专列“特殊述宾关系”一节,介绍了“使动关系”“意动关系”“服务关系”“与事关系”“目标关系”“工具关系”“原因关系”等七种。^①这样处理,不仅概括得更加全面,也更能突出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彰显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在这本教材中,关于古代汉语的句法部分,打破了以往只介绍“判断句”和“被动句”的做法,还介绍了“比较句”“回指与关联”等内容,吸收了新理论和新成果,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作风。

4. “文选”部分取材范围的变化

随着“古代汉语=文言文”观念的变化,《古代汉语》教材中“文选”部分也有很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王力等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及20世纪末以前的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都是仅仅选取传世经典文献,上自《诗经》《楚辞》《左传》《尚书》,下至“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以及诗词歌赋,的确体现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随着古代文化研究中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人们关于“古书”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甲骨文文献、金文文献、简牍帛书文献、石刻文献等出土文献也

^① 参见洪波主编:《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6页。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是珍贵的“古书”，所以近年新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一般都要在“文选”部分增加甲骨文、金文、简帛、石刻等方面的文章。尽管数量不多，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所谓“古书”，不仅仅包括传世文献，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献。如周光庆、杨合鸣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和荆贵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文选”部分都选编了甲骨文、金文篇目。

第二，对白话文献的重视。既然“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那么魏晋以来的白话文献同样不能被排斥在“古书”范围之外。如周光庆、杨合鸣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中，“文选”部分不仅选编了《世说新语》《百喻经》等中古白话文献，还选编了《朱子语类》《元典章》《朴通事》等近代白话文献。据了解，有的学校虽然在教材上没有编选白话文献，但是通过选修《白话文献选读》等方式，补充“古代汉语”课在白话文献方面的不足。

第三，对应用文体的重视。以往的《古代汉语》教材，多选择正统的文体，主要是诗词歌赋、历史散文、哲学论文等，对书札尺牍、哀祭文等应用文体重视不够。近几年新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改革。比如胡安顺、郭芹纳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就专门列出一个单元，选取历代典范的应用文体，选取了传状、论辩、杂记、奏议、诏令、碑志、哀祭、序跋、书启、箴铭、赞颂等 11 类，其中多数属于应用文体。荆贵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专列了“应用文言文”部分。其实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笔者曾经翻阅《欧阳修文集》，其中大部分文章属于应酬的应用文体，诗、词、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要“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不培养阅读“应用文体”的能力肯定也是有缺憾的。

三、《古代汉语》教学改革刍议

根据以上《古代汉语》教材编纂情况，文学院的“古代汉语”课教学要想与时俱进，要想让我们培养的学生与外校同类学生在“古代汉语”知识方面的距离缩小，首要的工作就是更换教材，最好是选用近年出版的、在知识系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更新的教材。其次，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知识更新也要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长期使用一种教材，也容易使教师的知识结构僵化、老化，教学内容模式化，课堂气氛死气沉沉，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师的知识更新能跟上学术发展，再在“古代汉语”课上讲“词类活用”“使动用法”之类的内容的时候，就能够把近年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新的认识讲解给学生，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至于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另外，也可以通过开设“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古白话文献选读”“出土

文献选读”等选修课程补充目前“古代汉语”课教学方面的不足。

以上是笔者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一个粗浅思考,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方家赐正。

附录: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开出版的古代汉语类教材一览表

(以出版年代先后为序)

王力等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1981 年修订版。

殷孟伦等编:《古汉语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1 月第 1 版。

周秉钧等编:《古汉语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 月第 1 版,后更名为《古代汉语纲要》,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 2002 年再版。

马汉麟等编:《古代汉语读本》,中州书画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第 1 版,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2 版,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1 月第 3 版。

张之强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李新魁编:《古代汉语自学读本》,语文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朱振家等编:《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解惠全主编、徐朝华编著:《古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许嘉璐等编:《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郭锡良、李玲璞主编:《古代汉语》,语文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第 1 版,2000 年 3 月第 2 版。

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黄河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 1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 3 版。

王宁主编:《古代汉语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张世禄、严修主编:《古代汉语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 2 版。

周光庆、杨合鸣主编:《古代汉语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解惠全、徐朝华编著:《古代汉语读本》,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王宁主编:《古代汉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张双棣主编:《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殷国光主编:《古代汉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洪波主编:《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胡安顺、郭芹纳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张博主编:《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教研室 张诒三)

王力《古代汉语》研究综述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本”),是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而制定的古代汉语专业教材,于1962年11月付梓。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其以科学的体例、精选的文章获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认可,在学术界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从而奠定了其在古代汉语教学领域的先导地位。对其展开的学术研究角度之多、范围之广、成果之丰,是同类教材望尘莫及的。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学术论文,下面我们进行分类描述。

一、学术专著

(一)《〈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萧泰芳等著《〈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以下简称《商榷》),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时代性的学术著作。该书对王本(1980年修订版)文选部分700余条注解提出了修正意见,并在原书注释的基础上,补充了60余条注释。对于自己存疑但暂无他解的解释,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决不妄下定论,这成就了《商榷》一书严谨科学的学术风格。

孙良明、张茂华对《商榷》一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书中注释过程中运用到的训诂考据方法作了归纳总结,从考证版本用字、解说文字、辨析句读、解析词义及语法分析等多个角度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爬梳整理。文中,孙、张两位先生给予《商榷》一书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训诂学运用于实践的新成果,堪作为今天高校学生学习训诂的活生生的读物,是学习古代汉语的良好、有效的辅导教材。同时,高度认可四位学者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认为四位学者充分运用古今考据、释义方法及语言学理论,对王本注释进行商榷性解释,立论有据,结论可信。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商榷》一书的出版,对古汉语、训诂学的教学都有着重大意义,为王本《古代汉语》教材的修订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但是,书中有一些不足之处。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中训诂释义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从语义关系分析与语译二者相区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允许有两可现象存在。同时,指出书中某些分析欠深透、明白,某些提法过于绝对化,但两位先生认为这些瑕疵不会损害本书的价值,此书仍然是当代训诂学实用方面的范例。

(二)《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以下简称《汇考》),富金壁、牟维珍著。本书依据原书分为14单元,并附录《诸说杂考》10则、《论文选录》3篇等。书中既有作者对王本注释的独到见解,又有引用其他学者观点之处。对于王本与其他学者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作者通过辨别分析来摆明自己的观点:王本中不误而其他学者撰文以为讹误的地方,以维持原注为原则;王本注解不足或解释有误的地方,参以其他学者的观点,广为细说,引而申之。《汇考》一书选文具有代表性,注释精粹扼要、深入浅出,可以作为学习古汉语的参考读物使用。

二、学术论文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学习古汉语的经典之作。笔者共收集到学界研究论文5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下面分类进行描述。

(一)整体评介性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由于课程初建,教育部尚未颁发统一的教学大纲,以至于学界对“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认识不清,各校教学内容杂乱不一,“古代汉语”课程建设非常不规范。1956年,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明确了“古代汉语”作为基础课的学科性质,确定了“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及教学方法等,这为“古代汉语”的教学和教材编写指明了方向。王本《古代汉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之后,不断有高质量的教材涌现,至今已有40多个版本面世,并且多个版本通行全国。目前国内多位学者专门著文文章将王本与其他通行本进行比较评析:

赵伯义选了不同年代的三种《古代汉语》教材——王本,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郭本”),郭锡良、李玲璞编写的《古代汉语》,并从编写体例、教学内容、学术观点三个方面比较其异同,指出三种教材各有所长,

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学术水平,反映出我国《古代汉语》教材的发展历程。

朱峻之选择的三种教材分别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的《古代汉语读本》、王本、郭本。作者首先对三部教材的总体安排进行比较分析,肯定了王力先生首创三结合的《古代汉语》编写方法,即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体系,并从这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三种教材的优劣得失;接着提出自己对《古代汉语》教材编纂的见解,提倡“四结合”体系,即文选、常用词、通论、习题四位一体的全面结合,为《古代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戴幼玲、邱晓辉、魏娟,从王本与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比较入手,谈及《古代汉语》的编写问题。文中对王本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第一次确定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性质,创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例,并于其中突出了文选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王本编纂体例对其后近三十年《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产生了巨大影响,文中认为“很少有超出此体例者”。作者在论及《古汉语》教材通论的建构时,认为把‘古代汉语’课程的性质局限在工具性方面,无助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发展。同时,还指出不同时代、不同版本对“古代汉语”的定位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社会思潮,认为“王本受‘五四’文化运动的余音和‘左倾’思想影响较重,对通论的重视不够正是体现了当时对‘古代汉语’课程建设仅仅作工具要求的认识现状”。

吕志在《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一文中,从王本写作背景出发,兼与王本之前的教材相比较,共总结出王本的六大特点,并结合王力先生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归纳出其对“三结合”教材教法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二)局部评介性文章

王本《古代汉语》在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教学中起到了良好作用,但随着学界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补正性文章,它们从不同角度对书中部分注解提出了修正意见。

1. 文选部分

王本三结合的教学体系以文选为纲,其他两部分跟它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文选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共收录 264 篇文章。在“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也最重视这一方面的教学。学生可以通过一个个篇目,以最直观的方式接触到古汉语的字词使用情况及语法现象,并将通论和常用词中涉及的知识点运用其中以加深理解。因此,对文选的注解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在收集到的 50 余篇论文中,有 42 篇对文选内容提出商榷,下面分别进行举例说明。

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

(1)句读

敏春芳在《〈孟子〉标注献疑——〈古代汉语〉教学札记》一文中,指出王本《孟子·公孙丑上·夫子当路于齐》中“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一句句读有误,并根据上下文意推断此句当从“易”字后断开,“然”字归入下一分句;还以此理通了赵注,认为王本断句当改,否则文章窒碍难通。虽然作者的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这种治学思路为我们学习古汉语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

(2)训释

对王本文选内容的训释主要是对于字词的注解,而关注度最高的是对通假字的训释,有数篇论文集中对这一点进行了专门论述。学者们一般认为王本在注释通假字时,往往将同源字、同义词、异体字、本借字与通假字混杂在一起,从而出现了误注现象。于智荣、杨萍在其文章中从以同源字为通假字而误注、以同义词为通假字而误注以及以异体字为通假字而误注等三方面,对王本通假字注释进行了辨析和匡正。李小平则以王本注释时使用的术语“某通某”为切入点,统计出王本《古代汉语》中共出现“某通某”217例(不含重复的),其中解释古今字的有47例,异体字的有17例,本有或可引申其义的有52例,真正属于通假字的仅有101例,占总数的46.5%。由此可以看出,“某通某”这一术语并不全用于解释通假字。这一结论对于学习古汉语的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在看到书中“某通某”的解释时,要注意区分是否是通假现象,切忌把通假现象扩大化。

对于文选中不少词语的解释,学者们也存在异议,其中不少观点是有理有据的。在王本《古代汉语》的几次修订过程中,不少修正意见被采纳吸收,这为《古代汉语》教材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

2. 常用词部分

王本4册书共有1000多个常用词。这些词在古籍中经常用到,出现频率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王本在编排这些词时,基本上以类为序,但有时为使其与文选相配合,同类的词也会在不同单元出现。有些词的意义古今差异非常大,书中一般只收常用义,但也会酌情收入一些文选中讲不到的意义。王本在这一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对于常用词的解释在学界是具有权威性的。目前在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中,对于王本常用词部分指误的文章是比较少见的。

陶振民在《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商榷》一文中,指出王本《常用词(八)》“止”的第二条解释采用的引文是有误的。王本引用《杜甫·无家别》:“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而原文诗句是:“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

身,远去终转迷。”书中援引失当,不应将上联末句与下联首句组成一联引用。我们认为陶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文章又分别从文字形讹、训释异误等角度对常用词及其他部分出现的错误进行了辨析,提出的观点是比较可信的。

3. 通论部分

王本没有把通论定位于系统性的理论,只讲最基本的东西。通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大致包含六个方面的知识:一是字典及古书注解,二是词汇,三是语法,四是音韵,五是修辞、古文句读及古文结构,六是文体特点。笔者收集到的对王本通论部分提出质疑的文章有三篇,分别从通论中模糊概念的辨析、《诗经》用韵分析和理论失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将内容陈述于下,供学人参考。

郑文澜对王本运用各种不同术语将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概念区别开来给予了肯定,认为在大体上还是稳妥的,但在具体操作方面应注意统一贯彻相关原则,避免出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现象。

黄阳在《对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诗经〉韵例的一些见解》一文中,肯定了王力先生对《诗经》韵例所作的全面研究,依据王力先生的研究结论推断出其韵例分析表,并依据系联法、分类法等相关知识对这一韵例表作了深入思考,对其进行了补充。

曾昭聪曾指出,王本教材中存在着两个理论失误:(1)关于形声字声符作用的论述。王本认为:“形声字是由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形声字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符表示形声字的声音。”作者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修正:一是声符不仅可以表示读音,还可以示源;二是形声字的读音不仅由声符体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形符与声符的组合共同表现。因此,不能轻易地说声符表示形声字的读音。(2)关于记录联绵词的两个字是否可以分别溯源的论述。对于组成联绵词的两个字是否可以拆开讲这个问题,王本是持否定态度的。学界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而曾昭聪者认为:“记录联绵词的两个字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拆开来讲的,即绝大多数联绵词中的一个或两个字可以分别推源。”在列举了大量例子的同时,他还引用了陈淑梅对联绵词的分类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三、结论

在众多《古代汉语》教材中,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在古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全书卷帙浩繁、内容繁多,一时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有学者撰文对《古

代汉语》编写问题与之进行商榷;80年代后,学者们针对该书展开了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学术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推动了《古代汉语》教材的修订编写。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自1962年问世以来,先后曾两次修订其稿,1981年出版第2版,1999年出版第3版。时至今日,印刷次数已达40余次。学界少有著作可与之媲美。希望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教材质量能够不断提升,并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师生。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莉莉)